

“突董事件”和平解决的原因探析

董红玲

(新疆昌吉职业技术学院 基础部, 新疆 昌吉 831100)

摘要:“突董事件”是唐朝自“安史之乱”后与回纥发生的一起重大事件,这一事件的和平解决,对彼此间关系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本文通过分析突董事件和平解决的原因,来透视双方关系发展的因素,以史为镜,从中得出在处理民族关系时应该借鉴的问题。

关键词:唐朝 回纥 突董事件 和平解决

一、“突董事件”的缘由及其正确处理的过程

1. 突董事件

建中元年(780年),新继位的唐德宗命令留在京师的回纥人归国,回纥可汗顿莫贺的叔父突董率领的商团也在遣返之列。史载:“突董尽师其徒归国,辎重甚盛。至振武,留数月,厚求资给,日食肉千斤,他物称是,纵樵牧者暴贱果稼,振武人苦之。”^[1]振武留后张光晟一患突董等人的骄纵,二则为了取其辎重,于是谋划劫杀突董商团。但是,此事毕竟关系到唐与回纥双方的正常关系问题,张光晟不敢贸然行事,于是上奏称:“回纥非素强,助之者九姓胡尔。今其国乱,兵方相加,而虏利则往,财则合,无财与利,一乱不振。不以此时乘之,复归人与币,是谓借贼兵,资盗粮也。”^[2]继而,张光晟又派其副将故意挑起事端,“使副将过其馆门,故不为礼,突董怒,执而鞭之数。光晟勒兵掩击,并群胡尽杀之。”^[3]张光晟把突董商团九百余人杀害殆尽,仅留一活口归国报信,突董所携物资“驼马千余,缯锦十万匹”^[4]尽数没收。这便是突董事件。

2. “突董事件”的缘由

突董事件的发生首先与回纥兵的骄横有直接的关系:755年中原发生了安史之乱,757年回纥兵与唐郭子仪的军队配合,很快打败安禄山叛军,收复洛阳和长安。回纥兵因平叛有功,日益骄横,及至收复东京洛阳,“逐入府库收财帛,于市井村坊剽掠三日而止,财物不可胜计”^[5]。762年回纥兵在洛阳,纵兵肆意暴行,“恣行残忍,上女惧之,皆登圣善寺及白马寺二阁以避之。回纥纵火焚二阁,伤死者万计,累旬火焰不止”^[6]。牟羽可汗在平叛中,居功自傲,肆无忌惮,回纥几次南下,深入唐境,目睹了唐朝的疮痍,“有轻唐色”。对于中原的积弱和财富有了清楚的了解,滋长了

其进一步劫掠的欲望。正是回纥在中原的恣意妄行,埋下了以后突董事件双方交恶的隐患。其次与唐德宗与牟羽可汗的宿怨有关:唐代宗时,为了平定史朝义叛乱再次向回纥借兵,回纥牟羽可汗与唐太子李适在太原会合,牟羽可汗因太子李适没有在其帐前舞蹈、行跪礼而大为不满,派车鼻将太子李适的部众韦少华、魏据当场打死。这件事对太子李适及整个唐朝来说都是一种耻辱。这表明牟羽可汗已不甘心再作唐朝的属国,他要取得与唐朝分庭抗礼的政治地位。李适陕州之辱后,牟羽可汗反唐的态度无丝毫改变。这就使唐德宗改变了唐代宗与回纥联合的政策,“不惮屈己,与西蕃结好,中以齐盟”^[7]。希望能与吐蕃结盟,疏远回纥,依靠吐蕃的力量为自己释恨。振武军留后张光晟深察德宗心意,所以对回纥突董商团,不分青红皂白大肆屠杀,以此来取悦德宗。

3. 突董事件的和平解决

突董事件发生后,德宗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不仅没有问罪张光晟,反而升了他官职。同时又下令前去册封顿莫贺的使者源休停止前进,留在太原原地待命。这些举动,很明显的是想断绝与回纥的关系。针对唐朝的态度,回纥内部传来“请得专杀者以复仇”^[8]的呼声。唐德宗方才意识到自己的极端做法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赶紧贬了始作俑者张光晟的官,仍令源休出使回纥,并把突董等四位官员的尸体送至回纥。回纥内部有些人主张杀唐朝使者源休以报复,源休到达回纥后,受到极大的冷遇及威胁。史载回纥“宰相颉干思伽坐大帐,立休等于帐外雪中,诘杀突董等故”。休曰:“突董等自与张光晟忿斗而死,非天子命也。”又问:“使者背唐国,负罪当死,不能自戮耶?不然,何假手于我杀之也?”凡将祭者数矣,言颇悖慢^[9]。源休在回纥滞留五十余日,“竟不得见其可汗”。名为唐朝的册命使,实质上已成为替唐朝承罪的囚犯。但是经历了一番痛苦的选择,顿莫贺最终并没有杀唐使偿命,以断绝双方关系,而是将其放归国。临行前派使者对源休说:“我国人皆欲杀汝,唯我不然。汝国已杀突董等,吾又杀汝,犹以血洗血,污益甚尔。吾今以水洗血,不益善乎!所欠吾马值绢一百八十万匹,当速归之。”^[10]并派遣其散支将军陪同源休来唐。唐朝国库空虚,最终东拼西凑以帛十万

[1]国学整理社.诸子集成.中华书局,1986.

[2]陈戌国撰.尚书校注.岳麓书社,2004.

[3]杨伯峻注.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

[4]杨天宇.礼记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5]董增龄.国语正义.巴蜀书社,1985.

[6]于英时.土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匹、金银十万两应付了事。这一数目并未达到所欠款额,但是顿莫贺可汗没有予以深究。至此,一场大祸总算和平了结。

二、突董事件和平解决的原因

1. 共同抗击突厥和吐蕃使唐与回纥结成军事联盟

回纥最初称铁勒,是高车诸部中的一个部落,长期受突厥的剥削压迫,没有得到发展。公元552年,突厥汗国建立。突厥认为“南边唐人本吾仇敌,北方Baz可汗及铁勒部族本吾仇敌”。^[11]六—七世纪,突厥一跃而成为亚洲大陆北部和东部的霸主。突厥的兴起,不仅威胁着中原地区,而且对于漠北其他游牧部落都构成了威胁。为了摆脱压迫束缚,漠北铁勒各部与中原政权逐渐结为盟友共同抗击突厥。回纥与唐朝联合薛延陀共同消灭了东突厥,接着唐与回纥联合又打败了薛延陀。自调露元年(679年)以后,东突厥降部开始了大规模的反唐暴动,整个唐朝北方陷入混乱。在回纥军队的帮助下,历经一年多,叛乱被平息。(682年)阿史那骨咄禄建立后突厥汗国,再次叛乱,叛军很快控制漠南,漠北地区。开元四年(716年),唐玄宗派“大武军子将郝灵佺”^[12]到漠北与回纥诸部联络,对突厥形成南北夹击之势。墨噶可汗被拔曳固部所杀,后突厥陷入混乱,其武功盛世的局面一去不返。在消灭后突厥势力的过程中,回纥迅速成长,漠北草原惟回纥最强。745年,回纥首领骨力裴罗建立回纥汗国,被唐玄宗册封为怀仁可汗。在与唐朝并肩抗击突厥的战争中,回纥各部最终走向团结,与唐朝结下了深厚的感情。没有唐朝帮助,回纥不可能迅速崛起,并称霸漠北;唐朝如果没有回纥在漠北的接应,也很难快速铲平反对势力。可以说,双方谁也离不开谁。这种休戚与共、唇亡齿寒的感情,使唐与回纥一直保持友好关系。

从龙朔二年(662年)起,唐朝与吐蕃势力开始在西域正面交锋,形成了唐与吐蕃在西域地区反复争夺的局面,唐与吐蕃前后战争断断续续历时近五十年。安史之乱以前,唐军总能在这场争夺战中胜出;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在西域的经营前功尽弃。回纥屡次派兵助唐平叛,“力微则奉命出征,势强则有请必至”^[13]。永泰年间(765年),吐蕃大军进攻平凉诸地,河陇大部分地区尽陷其手,唐朝东西领域分割为二。尽管唐军仍然驻守安西、北庭,但是经由伊吾、河陇诸地与中原唐朝间的交通联系则因吐蕃对河西地区的控制而中断。驻守西域的唐军孤悬塞外数十年,无法与内地取得联系。“白关陇失陷,东西阻绝,忠义之徒,泣血相守”。^[14]为了与内地取得联系,安西、北庭都护府使臣辗转数十年,最终借道回纥,“遣使历回纥诸蕃入奏,方知音信”^[15]。这条道路就是所谓的“回纥路”。这条道路不仅是唐与回纥连结的一条大道,更重要的是,它连结了唐朝在西域的经营。正是借助回纥的帮助,唐朝才得以继续对西域的经营。这也再一次见证了唐回双方患难与共的关系。

基于以上因素,唐回双方友好交往的历史久远。可以说,无论从政治还是军事原因考虑,回纥与唐都有共同的利益。如果双方的联盟解体了,任何一方都不会有

好的结局。正是这种不可分割的关系,使顿莫贺在如何对待和处理突董事件时,面临着一次严峻的考验,经历了一番痛苦的选择,他一方面坚持与唐朝保持传统的友好关系,另一方面也坚持自己的民族尊严与实际利益,最终并没有杀唐使偿命,以断绝双方关系,而是以水洗血,将其放归国。

2. 经济利益使回纥与唐化干戈为玉帛

回纥汗国盛产马,马是回纥生产、生活、战争的必需品,李唐王朝地处中原,以农业为基础,以丝绸著称于世,处于发达的封建社会。唐需要回纥的马武装骑兵,回纥需要唐的绢帛作为华服的衣料和转手的商品。双方进行绢马贸易,安史之乱后,唐朝军马严重缺乏,“搜监奴及私群”,^[16]仅得马数万。加之吐蕃乘虚而入,唐朝军队军马补给严重不足。故与回纥进行绢马贸易的数额较大。

“肃宗乾元中(758年),回纥仍岁来市,以马一匹,易绢四十匹,动至数万马”,^[17]“自乾元以后,益负功。每纳一马,取值四十缗,岁以数万求售”,“帝(代宗)厚赐欲以愧之,不知也。复以万马,帝不忍重烦民,为偿六千”^[18]“回纥有助收两京功,代宗厚遇之,与中国婚姻,岁送马十万匹,酬以缗帛百余万匹”。^[19]德宗建中三年,回鹘可汗曰:“唐负我马值百八十万匹,当速归之,诏以帛十万匹,余银十万两,偿其马值。”^[20]德宗贞元三年(787年),归其马价绢五万匹……其马价物,且付十二万匹。^[21]

绢马贸易对于双方来说,是“彼此丰足,皆有便宜”。回纥在绢马贸易中换取了唐的大量绢帛,不仅满足了本民族的生活需要,更重要的是,回纥依赖经商的九姓胡,把所得丝绸贩运到罗马等地,从中获取巨额利润,刺激了回纥畜牧经济的发展,同时对于回纥社会向定居农业的转变也有一定促进作用。对于唐朝来说,通过绢马贸易可以以优良的胡马充实部队,以加强战斗力,对外抗击吐蕃劲敌,对内打败胡汉骑兵为主力的叛军,以及接踵而至的藩镇割据,扭转“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局面。回纥从互市中看到了巨额经济利益,唐朝则更多从军事、政治上考虑,在突董惨案发生后,顿莫贺之所以能很快作出和解反应,与经济利益的刺激不无关系。这一因素也成了唐与回纥双方统治者在执行政策时的一个参考。大臣李泌以“边将告乏马,无以给之”^[22]来劝慰唐德宗,最终使德宗释恨。诸多材料都印证了绢马贸易是保持唐与回纥友好关系的关键一环。

3. 联姻促成唐回政治结盟

据统计,安史之乱后,唐代共有3位公主和亲回纥,回纥则有1位公主即毗伽公主嫁与唐敦煌王李承案。天宝六年(747年),骨力裴罗去世,其子磨延啜继位,是为“葛勒可汗”。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安史之乱”发生,至德元年(756年)年九月,唐肃宗派敦煌王李承案和仆固怀恩前往回纥请兵。葛勒可汗将其妻妹许配给敦煌王,唐肃宗则封其妻妹为毗伽公主。十一月,葛勒可汗亲率回纥军南下,与郭子仪合力“讨回罗诸蕃,破之河上”^[23]。至德二年(757年)九月,葛勒可汗遣其子叶护及将军帝德

等率精兵四千前来助唐平叛,并与唐军一起收复长安和洛阳。乾元元年(758年),回纥向唐请婚,肃宗遂以宁国公主许嫁葛勒可汗。七月,唐册封葛勒可汗为英武威远毗伽阙可汗,而葛勒可汗则立宁国公主为回纥可敦。乾元二年(759年)四月,葛勒可汗死,次子移地健继位,是为牟羽可汗,又称登里可汗。唐王朝封登里可汗为英义建功毗伽可汗,回纥又请和亲。大历四年(769年)五月二十四日以崇徽公主为回纥可汗继室,册为可敦^[24]。779年,顿莫贺执政回纥,被唐封为武义成功可汗。贞元三年八月,武义成功可汗遣首领墨噶达干、多览将军合阙达干等来贡方物,且请和亲。次年十月,回纥使者至长安纳聘,迎接公主,请改族名为“回鹘”。时武义成功可汗“害于和亲,其礼甚恭”^[25]。德宗遂以咸安公主妻之,并册封可汗为汧咄禄长寿天亲毗伽可汗,册公主为智慧端正长寿孝顺可敦。

由此可见,发生在李唐王朝与回纥可汗之间的和亲,并不是单纯的一般意义上的姻亲关系。常常是作为政治或外交斡旋的一种手段,与战争有密切的关系。宁国公主出塞换取回纥助兵平定安史叛乱,和亲使双方的政治联盟更加巩固,经济交往更加密切,同时也成为解决突董事件时双方慎重考虑的问题。尤其是咸安公主嫁与顿莫贺,标志着唐回双方已结束牟羽可汗时期的对峙关系,步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和亲奠定了此后六十余年间唐与回纥联盟对抗吐蕃的局面。双方能够在彼此逐步走向衰落的时候再次结好,更加体现了“患难相恤”的感情。

4. 统治者的个人因素

要了解突董事件的发生及正确处理的原因,不能忽视当时回纥的执政者顿莫贺可汗的个人因素。(1)突董是顿莫贺的叔父,且被杀者还有回纥的高级官员,包括大小梅录900多人,这些人在回纥地位举足轻重。作为回纥可汗,顿莫贺完全有足够的理由要求唐朝偿还这笔血债,但顿莫贺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以和平的方式平息这场冲突,这不能不说顿莫贺是一个有远见卓识的可汗,从处理牟羽可汗“欲举国入寇”的事件中也能看出这一点。大历十四年(779年),代宗去世,太子李适即位为德宗。牟羽可汗在九姓胡的煽动下,“欲乘丧伐之”。其宰相顿莫贺达干劝谏:“唐,大国也,且无负于我。前年入太原,获羊马数万计,可谓大捷也。以道途艰阻,比及国,伤耗殆尽。今若举而不捷,安将归乎?”^[26]但是牟羽可汗不听,“欲举国入寇”。顿莫贺达干力谏无效后,举兵击杀牟羽,自立为合骨咄禄毗伽可汗,并马上派使者到唐朝,请求册封。顿莫贺“乘人之不欲南寇”^[27]而发动政变,透露出他代表回纥内部大部分民众心向唐朝的意愿。可以肯定地说,顿莫贺是拥护唐朝统治的,正因为他亲唐,才会使突董事件得以正确处理。(2)顿莫贺本人通过政变上台,虽然袭杀牟羽可汗及其亲信与九姓胡近二千余人,但汗国内部仍然存在不稳定因素,危机四伏,时刻面临被颠覆的命运。因为他不是通过世袭执政,所以必须要得到唐朝的册封,才能服众。外部又面临素有旧怨的强邻吐蕃,吐蕃虎视眈眈,对回纥的经济大动脉回纥

路垂涎已久。在这种腹背受敌的情况下,只有与唐朝团结一致,才能渡过险境。(3)与唐和好,就是保证了汗国的稳定财源。中原唐朝是回纥最大贸易对象,除助唐平安史之乱,依定例每年赐绢两万匹外,还可以进行频繁的绢马贸易。代宗对回纥甚厚,回纥“发送马十万匹,酬以缣帛百余万匹”^[28]。如果断绝与唐朝的来往,这条经济命脉就断绝了,那对回纥将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从经济目的出发与唐保持友好关系,也是回纥历任统治者都采取的策略之一。

总之,突董事件的发生及和平解决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影响也是深远的。顿莫贺以唐“无负于我”为基点,提出“以水洗血”的政策。作为一个边疆少数民族的统治者,在处理与中原关系时,能够具备这种思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突董事件的和平解决使唐与回纥联盟的更加巩固,与周边民族关系的也逐渐融洽。可以看出,正确地处理民族关系才能保持稳定,维护统一,使民族关系和谐发展,达到民族团结和共同发展的目的。

参考文献:

- [1] 《册府元龟》卷448,将帅部,残酷。
- [2] 《新唐书》卷214,《回鹘上》,第6122页。
- [3] 《旧唐书》卷12,《德宗本纪上》,第326页。
- [4] 《旧唐书》卷12,《德宗本纪上》,第326页。
- [5] 《旧唐书》卷195,《回纥传》。
- [5] 《资治通鉴》卷226,第7288页。
- [6] 《旧唐书》卷195,《回纥传》,第5204页。
- [7] 《旧唐书》卷13,《德宗本纪下》,第363页。
- [8] 《资治通鉴》卷226,第7288页。
- [9] 《旧唐书》卷127,《源休传》。
- [10] 《旧唐书》卷127,《源休传》;《资治通鉴》卷227,第7331页。
- [11] 《阙特勤碑》,东面第14行,载岑仲勉:《突厥集史》下册,中华书局,2004年5月出版,第881页。
- [12] 《新唐书》卷5《玄宗本纪》,第125页。
- [13] 李符桐:《回纥史》,文风出版社印行,1963年5月出版,第45页。
- [14] 《旧唐书》卷12,《德宗本纪》,第329页。
- [15] 《旧唐书》卷12,《德宗本纪》,第329页。
- [16] 《新唐书》卷50,《兵志》,第1339页。
- [17] 《册府元龟》卷999。
- [18] 《新唐书》卷217。
- [19] 《新唐书》卷51。
- [20] 《资治通鉴》卷227。
- [21] 《旧唐书》464。
- [22] 《资治通鉴》卷223,第7501页。
- [23] 《旧唐书》卷10《肃宗纪》。
- [24] 《唐大诏令集》卷42《册蕃册文·册崇徽公主文》。
- [25] 《旧唐书》卷195《回纥传》。
- [26] 《资治通鉴》卷226,7282页。
- [27] 《资治通鉴》卷226,第7282页。
- [28] 《新唐书》卷51,《食货志》,第1348页。